

吉拉斯和毛泽东的预言

— “文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

陈东林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ジラース, 1911—1995。又译德热拉斯)，曾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1954年1月被南共联盟开除出中央，之后，又逮捕判刑。1961年吉拉斯被提前释放。《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是他在1956年写的，1957年在美国出版，1963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中文本，主要是供高级干部阅读。中文本出版10个月，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新阶级斗争的观点——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¹。和吉拉斯的矛头所指惊人地相似！

毛泽东是否看过《新阶级》一书？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一般毛泽东在会见外宾闲谈时，总爱提起他最近看的外国著作。从笔者已经看到的毛接见国宾党宾内部谈话记录看，他未提到过这本书。然而，作为当时发行范围很小，专供高级干部和少数专业人员阅读的内部灰皮书之一，毛泽东在热衷于国际共运大论战的60

年代初期，肯定不会放过。而且，毛泽东的“文革”核心理论——即“走资派”理论——的提出时间，正好在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底，很有可能受到了该书影响。

下面对比一下两者的异同。

一. 关于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

吉拉斯宣称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即通过权力垄断和使用、管理和控制国家财产的官僚特权阶层。据此，他提出了“新阶级”的概念——干部是新资产阶级²。

毛泽东从50年代末期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到60年代初期开始转入新阶级斗争理论。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³毛泽东当时即对这一提法有保留意见，认为“决议”通过草率了。后来在1967年11月的一次谈话里，毛泽东又指责八大“决

² 本文所引吉拉斯观点，均出自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翻译出版、供内部参考的《新阶级》。

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他的意见就通过了⁴。

1957年反右斗争开展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年底他要求修改浙江二届二次代表会议报告，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⁵但是，究竟“资产阶级”应当具体表现为什么？他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虽然斗争扩大到了党内高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说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没有对敌对阶级的主体作出新的定位判断，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整体上的“资产阶级”的问题仍然没有新的表述。

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中关于“四清”的主要矛盾和性质提法，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提出：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⁶。刘少奇则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两人发生了尖锐分歧。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断完成了剧变，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⁷。

1965年1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蹲点报告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4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1967年11月。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630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9—1131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⁸。

1975年，毛泽东在回答李先念的疑惑时作出结论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⁹在理论上把“走资派”最终确定为新“资产阶级”。

二. 关于“新阶级”还是新特权阶层的问题。

吉拉斯在当权时，还认为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只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特权阶级。他宣称，判断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是否掌握所有权。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拥有它们；另外，官僚职位不是世袭的。他被捕以后，出版《新阶级》，首次使用“新阶级”阐明了新看法，提出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吉拉斯据此断言：苏东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成了“新阶级”。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究竟是“走资派”的“派”还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的问题，不断交叉反复。这是研究“文革”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新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前者是传统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后者是全新阶级分析理论下的斗争。

“文革”时期的1967年11月，毛泽东在谈到“整党”时说：“文革”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并指出问题是：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暮气很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9 《毛主席重要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支部书记就像个皇帝等等¹⁰。

1975年秋冬，毛泽东重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时说：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¹¹。

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两者是混淆不清的。他个人性格也造成这种认识，总是支持小人物，反对大人物和领导层。在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他实际就倡导了反官僚主义的造反精神，不过由于错误的方法很快导致运动失控和国内确实有人反对共产党，使他突然收敛，转而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但应该说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现实（如日本留学生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1969年被大量印行），群众中不少人便认为这些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积极进行造反批判。诚然，“文革”中并没有出现多少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已经不够火药味。实际上，当时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现象，除了正常的差别被夸大（如指责驻外使馆官员穿讲究衣服、坐豪华汽车等）以外，其他压制群众、脱离劳动、追求享受等几乎都是官僚主义特权作风性质。

这些说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不清的，至死也没有明确。

¹⁰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1967年11月。

¹¹ 《毛主席重要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三. 关于产生“新阶级”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吉拉斯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制度使然，必然产生专制制度，使干部阶级不仅占有政治上的独裁，而且能够在经济上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剩余价值和全民所有财富。

毛泽东在政治上认为是旧中国制度遗留的问题，使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弊病。他在经济上则比较含糊，1958年就支持张春桥的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建议，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到1975年，他后退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认为“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做到”¹²。

解决的办法，吉拉斯主张实行多党制，废止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则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造反夺权，搞“四大”，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

其近似点，是毛泽东的“文革”，依靠力量不再是党的干部，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被踢开。党员和工人、农民、劳动模范等干部的外围，在“文革”前期，往往被当作保守派的代表遭到打击。而新的无产阶级，则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中的造反者，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后者往往在传统的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中不那么干净。甚至有不少在“文革”前被划为“资产阶级”的人物。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新阶级力量的依靠，是不坚决的。从1968年夏季开始，红卫兵又退出历史舞台，被当作小资产阶级，去接受传统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再教育。同时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及清查516运动，再次把历史问题即传统阶级成分作为划分敌我标准，打击造反派。到1973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不分“阶级”的“反潮流”运动及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造反派重新崛起。这是“文革”十年反复和动荡不断的主要原因。

其根本不同点，第一，是毛泽东仍然坚持共产党的专政，不搞多党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

¹²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谈话，1975年6月。

反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在“文革”中，这个限制条件仍然存在，只是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毛泽东 1967 年 2 月曾经严厉批评了那种“彻底砸烂”、“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指出“这个运动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¹³。尽管在一个时期里，党组织一度瘫痪，但毛泽东、中共中央仍然能够通过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以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革命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控制局势。在整党建党中得到恢复的各级党组织，是中共能够最终结束“文革”动乱的根本保证。

第二，毛泽东判断产生新资产阶级的依据，是思想和路线，而不是占有经济资料和分配权的问题。而无论马克思还是吉拉斯，都是围绕所有权的问题做文章。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曾经一度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归结于走资派占有了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认为在 1975 年公有制经济占 95% 以上的中国，仍然会出现资产阶级专政¹⁴。这很接近吉拉斯的观点。但张的说法很快被毛泽东制止，仍然回到思想、路线问题上来。在经济上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工资差别，搞平均主义，提倡无产阶级艰苦朴素作风，对新提拔为高级官员的工人、农民实行强制性低待遇。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等，仍然拿原来在工厂的几十元工资，每个月要原单位把工资和粮票都送到中央来。以至于吴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每杯茶要收两毛钱，时间长了她喝不起，要服务员只上白开水。其他如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位时仍然住在小破房子里，家人仍然在工厂和插队。

¹³ 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1967 年 2 月。

¹⁴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四. “新阶级”理论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三个世界”理论。

吉拉斯的《新阶级》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民族共产主义”的概念，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向，认为“用意识形态统一世界”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经济统一。在这方面，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他没有多少共同点，毛泽东强调的是斗争的需要产生联合阵营，但他们否定国际主义，抛弃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来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是一致的。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一次向美国明确提出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一条线”和团结这条线周围“一大片”国家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构想。¹⁵

1974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又提出：“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¹⁶

如果说，“一条线”和“一大片”还只是中国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或者说是中国古老的合纵连横外交权术，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使中国周边面临的巨大压力得到缓解，开拓了一个对外关系新格局。但是，也引起了越南、朝鲜等与美国对峙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所谓“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只是一个松散的立意，并未能切实地得到实现。真正颠覆以阶级和意识形态划分国际敌我友，是毛泽东稍后的“三个世界”理论。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明确、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问卡翁达：“谁是第一

¹⁵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页 367。

¹⁶ 陈东林主编：《中国 20 世纪通鉴》第 15 卷，线装书局 2002 年版。

世界？”卡翁达仍然按照中国传统的“反帝反修”划分标准回答说：“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毛泽东又问：“第二世界呢？”卡翁达回答：“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周恩来跟着附和说：“总统阁下说得很准确。”毛泽东却反驳说：“搞不清楚呢。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从此以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就成为中国新外交方针的主要宣传口径。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但仍然肯定“三个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文革”时期仅有的几点积极贡献之一。

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与他一年前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说，“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支持弱小国家，反对霸权国家，是中国公开打出的一面道义旗帜，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石。而联美反苏“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则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实用主义大国关系谋略操作，是中国基于自己国家利益，认为苏联威胁更大而考虑要打的一张牌，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一定吻合。在某种场合，如在欧洲，中国需要第二、三世界国家支持美国抗衡苏联；在某种场合，如在越南和中东地区，中国又需要这些国家支持苏联与美国抗衡。“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条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实际上又打乱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构架。因此“一条线”及“一大片”战略，中国并不正式宣扬。

但是，划分“三个世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依据，不仅与列宁以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格格不入，也放弃了1960年代中共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

反动派”划分敌人的意识形态标准。“三个世界”的具体划分，也存在着模糊区。第一世界只有美国、苏联，是非常明确的；但第二、第三世界中一些国家就无法界定。比如，中国将除了日本的亚洲都划为第三世界，但无论从经济发展程度还是与美国的军事结盟关系，韩国、以色列都很难与北朝鲜、阿拉伯国家属于一类。再比如，被苏联严密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与苏联剥离开来，划到第二世界，也不符合实际。

如果从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考虑，“三个世界”的划分倒是带有某种不结盟的色彩，比较接近19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在阶级斗争时代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注定了“三个世界”只能发挥过渡作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放弃了“三个世界”的提法，回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来。但“第三世界”的提法在很长时期内仍然作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代名词。

五. “文革”对旧社会阶级结构的破坏为新体制的诞生扫清道路。

从动机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一方面是看出了旧体制中存在着干部和群众对立的趋势，忧虑这种趋势最终将产生“官僚资产阶级”。应该说，19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了毛泽东有预见。他一直在寻找改变体制的时机和办法，最终决定用极左的“文革”重组这种体制。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三大改造以后随着阶级的逐渐消亡，阶级斗争已经成为无根之木，力图建立一个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否定了“文革”前的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因此，“文革”对改革产生了催生作用，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

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

“文革”造反与其他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区别，是打乱了过去的政治社会结构。干部遭到打击，群众的划分标准也不是党员或拥护党员、干部。从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革命的标准，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路线觉悟”。根据认同程度，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文革”初期反对党委和工作组，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否定“文革”前17年的政策、制度，家庭出身和成分较为复杂，以“文革”前没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为骨干，被对立面斥责为“牛鬼蛇神大杂烩”。组织名称中一般有“革命造反”字样，如“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另一派是保守派，“文革”初期拥护党委和工作组，后来口头上也拥护“革命路线”但内心仍然对“文革”前的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有感情，以“根红苗正”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及“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等为骨干，被对立面斥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名称中常常反映出来成分和保守态度，如“产业军”、“工人赤卫队”、“捍卫团”等。通过夺权担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再含曾说：“现在依靠力量变了”，“要用知识分子的左翼，改造工人阶级的右翼”。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大量吸收群众造反派参加的新国家政权形式——“三结合”的“巴黎公社”——革命委员会。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和恢复的党委中，补充进了大批群众代表，以改变过去干部占全部的政治状况。1968至1969年经中央批准成立的20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中，群众组织代表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各省平均为54.8%，其中广东、吉林、浙江、湖南、辽宁、云南、福建、新疆都在60%以上¹⁷。这些群众代表产生的首要条件，就是

¹⁷ 参见陈东林《“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制度研究》，《史志研究》1997年第2期。

在“文革”前期积极造反，有“路线觉悟”，是否党员和阶级出身是次要的。毛泽东试图以这种办法改变“文革”前的状况，消除干部与群众的对立。

虽然全面内战使得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局面，不得不退让，从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文革”又逐步向传统阶级斗争模式回归。但是，真正代表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无疑是前三年时期，而且他决不允许否定这三年的理论。因此，“文革”后期的社会领导层实际上是一个原有政治地位的干部和以“路线觉悟”产生的造反派组成的混合体，并不是“文革”前的结构。

可以说，毛泽东用“文革”打乱了他建国初期就建立的干部为主的社会阶级结构，客观上为“文革”后中共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思维扫除了障碍。如果没有“文革”的打乱，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阶级结构仍将延续多年，很难想象包括“资产阶级”的大批群众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在改革中大大提高经济和政治地位。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综上所述，所谓“新阶级”问题，是一个国际共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毛泽东是否受到吉拉斯《新阶级》一书的影响，但他的“文革”核心理论，实际上是在试图解决新阶级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文革”中光怪陆离现象的一把钥匙。

六. “文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本质上讲，使之受到最根本触动的是“文化大革命”，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包括改革开放都没有触及。改革开放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触及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呢？就是说共产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一直被困惑的，是一个阶级问题。

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但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向何处去，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了。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提出了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但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适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又再次提到了我们面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不改变根本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搞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类改革，这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搞过一点的，但邓小平放得更开、走得更远。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底线。但是，现在看到了，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使中国社会蕴藏着巨大的矛盾——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分化悬殊。

这个矛盾的最初表象，是“官倒”——一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计划供应的低价紧缺物资，在市场上用高价抛出去，获取差价利润。1988年，邓小平在听身边一些人说明市场和计划价格双轨制弊病时，也看到了这个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隐患。一些人对他说：趁着你在世，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中国改革就一马平川了。他采取了物价闯关的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物价和工资，使所有的物资都实行市场价格——以消除用权力置换金钱的制度弊病。但是，物价闯关很快失败了，“反官倒”成为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导火索。

1989年5月，加美光行教授在北京饭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和1966年的红卫兵有什么不同？我当时回答：前者是有个人崇拜的造反，后者不崇拜任何人，只崇拜自己。但这只是表面的回答，不是从体制上的回答。

现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大陆中文本正在中国热销，和香港中文本相比，有不少删节，一处重要删节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香港中文本中写到：“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1989年风波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官倒的措施。但是，没有几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腐败问题没有解决，很快卷土重来。已经由干部子弟经商倒卖，发展为官员自己与商人勾结“寻租”，甚至通过拍卖破产资产直接廉价获取产权，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获取计划和市场造成的供应差价。

对此，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开始思考解决办法。当时引起了“资本家能不能入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否过时的理论界大讨论，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一些高干子弟官员，如吉林省委书记林炎志（林铁之子），提出要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新资产阶级，从而限制并利用资产阶级。如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其父为“文革”前的吉林省军区司令员），要求不能发展私人企业入党。如李铁映（其父为李维汉）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剩余价值新反映的研究课题。但这些讨论很快就被停止。

十八大前夕，薄熙来事件发生，实际上也是问题的继续。薄试图用毛泽东当年的“文革”反“走资派”理论来制约腐败，在“打黑唱红”的“专政”行动之外，他采取了使私营企业小型化、加大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增加对农民福利分配如廉价房等手段。薄失败了，被斥责为“文革”的翻案。即使没有他自身的问题，他那套办法也不能解决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如何制止腐败干部成为一个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因为贫富分化悬殊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

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现有体制仍然可以使腐败干部用合法的非法的手段占有人民的剩余价值。像铁道部那样从部长刘志军到司、局、处级官员大面积集体侵吞国家资产，重庆一个妓女赵红霞把十四名重庆局级领导拉下水的腐败问题，是很难靠这个单位甚至上级单位的纪检系统来解决了，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腐败干部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叫新阶级。正如温家宝前不久指出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比现任领导人早几十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未来出现的主要矛盾。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禁止吃喝、出行封路等八条纪律（事实上，这些针对作风的措施，在胡锦涛刚刚即位时也曾做过，胡当时的口号是“求真务实”，保持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习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更多的人尚在观望如何解决根本问题。下一步，推出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迫在眉睫。这个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腐败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也可能产生群众对干部财产的质疑风潮，而像 1966 年炮打“走资派”、像 1989 年全民“反官倒”那样成为一个导火索。

回顾历史，我想，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比较早地预见了一个本质命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共产党将来不走向和人民对立，共产党内将来可能要出现特殊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他解决的尝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第二个特点是要“继续革命”，要解决干部阶层走向与人民对立的问题。

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继续革命”是失败了。如何在没有“专政”的条件下，解决毛泽东提出的“新阶级”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关键。